



社会学译丛

THE ROOTS OF RADICALISM

Tradi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Movements

# 激进主义探源

传统、公共领域与19世纪初的社会运动

〔美〕克雷格·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 著 甘会斌 陈云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学译丛

THE ROOTS OF RADICALISM

Tradi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cial Movements

# 激进主义探源

传统、公共领域与19世纪初的社会运动

[美] 克雷格·卡尔霍恩 (Craig Calhoun) 著 甘会斌 陈云龙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69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进主义探源：传统、公共领域与19世纪初的社会运动/(美)卡尔霍恩(Calhoun, C.)著；甘会斌，陈云龙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

(社会学译丛)

ISBN 978-7-301-27058-5

I. ①激… II. ①卡… ②甘… ③陈… III. ①社会运动—研究—19世纪 IV. ①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4501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2012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书 名** 激进主义探源：传统、公共领域与19世纪初的社会运动  
Jijin Zhu yi Tanyuan: Chuantong、Gonggong Lingyu yu 19 Shiji Chu de Shehui Yundong
- 著作责任者** (美)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 著  
甘会斌 陈云龙 译
- 责任编辑** 武 岳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058-5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4.5印张 363千字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序

差不多在整个成年时代,我一直断断续续在写这部书。我担心这可能透显出风格的不一,而不是智慧的累积。不过当然,但愿要点是清晰明了的。我最初是对19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尤其是对工业革命时代的大众抗议进行历史研究,从此开启了这项工作。探究19世纪的法国和美国让我的识见为之一宽。然而本书虽说提供了贯穿着这些个案(主要是英格兰)的历史社会学,却不是它们任何一个的完备历史,更谈不上是对它们三者的充分比较。毋宁说它尝试着辨识民众激进主义中的模式和主题,它们被那些主导理论遮盖住了。历史误解和理论局限之所以重要,部分是由于它们导致了今天的错误分析。

尤其是,学术研究者、新闻记者以及不过是自以为见多识广的那些市民,他们难以理解平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运动。的确,他们一再惊诧于这样的运动,认为它们是向过去的复古倒退,那一过去据料正在消逝。轻飘飘地认为参加者是误入歧途或恋旧守成,这简直不成其为一种分析;试图在左—右两翼间把这种运动加以分类,则扰乱局面远过于澄清事态。两种反应既揭示了这些运动的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特征,也同样揭示了分析者与运动积极分子之间的社会距离。

问题不仅出于众多分析者对平民主义政治不善辨音观色(虽然他们确乎如此),甚至也不仅出于对平民主义的精英阐释中所存在的阶级偏见因素。它还因为平民主义政治常常让借以理解那些运动的常规范畴手足无措。物质利益不能充分解释那种政治,尽管现实苦难和郁郁不得志往往有重要影响。将它们当成“不过”是文化运动,这大概误解了文化的意义可能怎样富于物质性,因为它所形塑的不单是理想,还有

团结和对立,战略和战术的选择,对经济形势和前景的洞察,对领导者的品鉴,或是对挫败的忍耐。类似问题亦见于民族主义政治和宗教政治当中。试图将这些运动剖别成进步的或反动的照样不无疑问,尤其是因为就在许多运动奋力捍卫现存(或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之际,它们也带来了社会变迁的压力。这并非唯一的悖论;某种意识形态承诺和某一套社会制度可能多数时候是保守的,而当人们觉得受到威胁时,它们又可能构成深层政治挑战的基础。

无论如何,本书不是对平民主义(更遑论民族主义政治和宗教政治)的综合性研究。它所考察的是政治激进主义得以被传统渗透、被社群维系的方式,道德修辞得以扣合物质利益分析的方式,主导公共领域因排斥而成型的方式,以及这个过程形塑替代性构想的方式。这些主题在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中已经显得事关重大,在形形色色的平民主义运动和追求社会正义的斗争中亦然。整个现代时期,在世界各地,这样的动员层出不穷。事实上,随之而来的对“人民”范畴的政治性援用,可能属于现时代的规定性特征。

我没有宣称这本书里远为浅陋的经验基础是有代表性的。倒不如说,我认为开始于19世纪早期的这些运动本身就趣味盎然,并且适合用来观照将一切政治均置于左—右光谱上的局限性。另外很说明问题的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述通常曲解了这些运动,虽然那两种主义和它们相伴而生。传统见解的失效要追本溯源到19世纪初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要与对社会变迁和问题重重的政治权力行使的种种反应争胜角力,那些反应不够理性、不够系统却有深厚根基。

当“新社会运动”挑战一种较为陈旧的政治左派观念时,我启动了催生本书的这项研究。当政治右派设法把常常激进而诡变得超乎保守主义政治家所欲的一系列平民主义运动纳入麾下的时候,我正将本书付诸梨枣。在每种情况下,硬把政治塞入左—右对立框架的尝试都是失真的。认同的等级和塑造新社会运动的其他事务不只是表面客观的共同利益的反映,也不尽是转移对那些利益的注意力的意识形态障眼物。同样的,将如今的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种种运动说成是“右翼的”而轻率打发,映现出我们拙于思索社会变迁的主导模式何以及如何

会给许多人造成挑战,他们在做出回应时又为何自认为代表“人民”。我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够激发对于那些并非完全符合传统范畴的运动的  
新思想。

本书一半章节初刊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抗拒大刀阔斧修改旧文的诱惑可不容易。然而哪怕是小修小补,似乎也打开了无休止修订的潘多拉盒子。妄图装扮得仿佛我在撰文时知道得更多,这似乎也不诚实——特别是既然我在抗拒重写一切的更伤神的诱惑。原来的文章多是为给予它们像是值得保护的历史位置的争鸣和思想课题而作。所有文章继续在被人引用,这让作者感到快慰,不过难得合在一起或当作整体思路的组成部分来引证。它们发表在不同地方,有的更多被历史学家采择,另一些则更多被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采择。尽管我听凭各文保留其自主性,但它们确实配合起来是个整体。这“整体”或许尚不够完整;假如时间无限,有许多主题我愿深论,有许多实例我愿扩展。最要紧的是,虽然本书检视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运动,它却绝非丰满成熟的比较研究,甚至也不是任一国的运动的全部相关方面的研究。但是不同章节通通归向一个公论点,它是我认为今天还有用的东西。

当较老的章节(第3、6—9章)首次发表时,它们加入了一场争论,涉及阶级分析的突出性,尤其涉及工人阶级的形成在西欧资本主义里的中心性。这是20世纪70—80年代一度叠合的“新社会史”“社会科学史学”的跨学科运动与历史社会学的复兴其中的一个核心论题。<sup>①</sup>主要关注点在这每个领域内来回转移。有的章节着重探讨到80年代中期几成“正统”的一个主题:工匠和手工工人对激进动员的重要性。<sup>②</sup>这质疑了“无产阶级”范畴在较早时期的诸多移用,也质疑了新工业里的工人经验是激进运动之源的看法。但是争论不限于那个历史环境。其实我的焦点落在一些理论范畴上,它们深深影响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以及日后对它们的反思。有时人们借用这些范畴,仿佛复杂的

---

① 对这一历史重合性的某些方面的讨论,参见 J. Adams, E. Clemens, and A. Orloff,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亦见 Gerald Delanty and Engin Isin,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② Mark Traugott, “Review Essay: European Working Class Protest.”

所指对象是简单明了的,或是建立在较早历史的错误概括基础上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有机部分。我特别说明了让激进主义观念摆脱与革命和阶级分析观念乃至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观念的过紧联系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激进主义、文化、地方依恋与支撑共同体和运动的那些社会关系的中心地位。这些是理解频发的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族群冲突的锁钥。

我设法驱散的阴影是由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投下的,它认为是贪权恋栈的顽固贵族、推行渐进政治改革新计划(结合着对私有财产的捍卫)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渐渐联合了劳工或工人阶级运动挑战现有权威的激进分子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斗争。虽然不尽失实,但这样的叙事是误导性的。它们让我此处所称的“传统激进主义”彻底从属于劳工或阶级意识——许多这种激进主义的运动,试图保存遭到资本主义桎梏的生活方式,或者追求根源于前资本主义或前工业的记忆而非新生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的劳工组织的种种价值。它们随时准备将另类社会秩序的众多不同愿景还原为本质上是经济的阶级意识观念的变种,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利用各种传统和他们自己的想象,拓展他们对社会生活可能形式的觉识,这才创造出那些愿景。它们没有充分注意到两种激进主义的差别:一种意指求助于第一原则的那些哲学分析或设计新社会秩序的那些举措,一种意指对现存权力的实质性挑战,那至少会真正使社会组织有产生深刻断裂之虞。它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活跃于其中的主导公共领域与庶民挑战者及其反公共领域之间划界太过分明。许多激进分子想要被容纳进主导公共领域,仅在排斥的压力下才组建反公共领域;许多人想要适量财产带来的安全感和独立性或者就业保障,他们挑战的不是这些价值本身,而是强者牺牲弱者福祉实现资本积累的方式。

## 致 谢

像 19 世纪初的激进作家们那样,我愿声称独立是参与公共领域的一种思想状态。别人无须为我的错误负责,我将承担一切后果。不过,冒称我可以独力完成这项工作或者独揽全功,那就是恣意诬夸了。像所有作者那样,我蒙受了太多恩惠,不能一一答谢。既然本书是近三十年时间中断续写成的,我的感恩范围就很宽广。但有些非提不可。

首先,有若干机构给我提供了改进工作的环境。供职机构至关重要,尤其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纽约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每个机构的同事们都让我受益匪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理论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和纽约大学政治学、文化和社会理论方面的 NYLON 工作坊,不但一直是支持和评议的源泉,还是新思想视角的源泉。社会心理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中心虽然制度化程度极低,却仍是大约 28 年时光里影响更深的力量。我的工作基本上贯穿着对思想传统和新公共问题的探索,那些都是与工作网络里的朋友和同事分担共享的。

许多人的评论和建议令本书各章增色。既然这里的篇幅不够道其万一(试着这么做就显得狂妄),我希望我可以感谢彼得·比尔曼(Peter Bearman)、伊丽莎白·克莱门斯(Elisabeth Clemens)、詹姆斯·爱泼斯坦(James Epstein)、莱昂·芬克(Leon Fink)、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辛西娅·哈哈莫维奇(Cynthia Hahamovitch)、安德里亚斯·科勒(Andreas Koller)、劳埃德·克雷默(Lloyd Kramer)、本·李(Ben Lee)、迈克尔·帕西(Michael Passi)、穆伊什·普殊同(Moishe Postone)、李·施莱辛格(Lee Schlesinger)、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比

尔·休厄尔(Bill Sewell)、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马克·特劳戈特(Mark Traugott)和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而不将他们牵连进他们不会认领的我的项目的各部分。莉娅·弗洛伦丝(Leah Florence)和欧文·伍利(Owen Whooley)各自在文字编辑上给我很多帮助。这是我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道格·米切尔(Doug Mitchell)合作的第四个项目。他是位精益求精、孜孜不倦的编者。他的习惯是从作者致谢中删除感激之辞,但我要再次试试偷塞点儿进来。

迈克尔·麦夸里(Michael McQuarrie)是书中一章的合作者,也将全书通读一遍,提出了无数真知灼见。实际上,同麦克相切相磋在鞭策我完成此书上起了大作用,我铭感在心。好学生常常给老师很大教益,我在这项研究的课程中也承教于他人,但麦克的贡献超乎寻常。

在此处表达的思想逐步形成的三十来年里,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养料——思想的、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来自帕姆·德拉吉(Pam Delargy)。将本书献给她简直不算酬谢,它不过是区区承认,还远远不够。

#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重新定位激进主义 / 12

第二章 社会运动与进步观念 / 47

第三章 传统激进主义：共同体力量还是庄严的伪装和借来的语言？ / 88

第四章 权力场的公共领域 / 133

第五章 不情愿的反公共领域 / 168

第六章 阶级、地方与工业革命 / 201

第七章 工业化与社会激进主义：英法工人运动与 19 世纪中叶的危机 / 221

第八章 经典社会理论与 1848 年法国革命 / 255

第九章 19 世纪初的新社会运动 / 279

第十章 进步为了谁？ / 315

参考文献 / 353

## 导 论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运动”一词几乎成为社会变迁的同义语,尤其是深入到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和社会关系之中的那种变迁。它涉及历史正在行进的路线——只要你懂得,那条路线是少数精英对国家和私人财产的控制被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所取代,极度的不平等被平等主义的包容所代替,以及众多人口的物质福利问题日渐具有政治中心性。所有这些变迁都因财富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可能。最终,这个词的用法开始益发强调确保或至少促发这种进步的集体行动的重要性。社会运动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或者假如那个词语的党派性太强的话,则可谓变成了一批广泛的劳工和民主动员。这种见解的主导地位致使许多人在评价其他运动——宗教的、政治的、区域的、民族的、废奴的或者禁欲的——时,以它们对那种社会运动,进而是进步的社会变迁进程的贡献多寡为标准。

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研究自诞生之初就受到这种历史进步观的形塑。与这种理性追逐公认集体利益模型不相吻合的集体抗争,经常被贬低为仅仅是“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它们被认为好像是盲目的,好像是内在非理性的,反映了对正常社会变迁过程的“简化式”(short-circuited)理解。诚然,从事于进步的不同问题和方面的那些运动,如民族解放、和平事业或者女性权利等,也得到人们的承认。对于谁才代表进步的路线,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人们存在意见分歧。尽管在这些(和别的)问题上,经验文献全都日益丰富,但是存在着某种倾向,要继续维持那种不得不做的抉择:要么是进步主义的历史阐释,要么是这样的隐含之意——群众强加的、

有时受叛乱支持的要求属于集体心理学的事情,不是政治学的事情。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们开始超越这一暗含的强制抉择,开辟研究领域。一群研究者开始将运动领导人的意图和意识形态问题与运动是如何组织和开展的问题区分开来。他们问道,不论一个人目标如何,他是怎样制造一场运动的?他们集中关注资源动员、运动策略和领导结构。很多研究者表明群众——即便是暴乱中的群众——有着理性的、选择性的和常常较为克制的性质,由此直接挑战将大众说成是内在非理性的那些“集群行为”视角。这些研究者成为现代社会运动研究极富影响的奠基者。他们的标志性成就之一是将社会运动研究整合进抗争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研究。这意味着一方面承认运动是政治变革的重要而合法的基础,另一方面承认名副其实的政治学包含融合与排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以及社会变迁的方向等基本问题上的抗争,而不只是哪些精英来统治或者哪种多少有点传统的意识形态独领风骚的选择问题。

这一新视角既受到重要学术研究的推动,也受到对有利变革的起义和运动的广泛得多的同情的推进,尤其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也宣告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又一个开端。它全神贯注于参与政治,表现在对 20 世纪 50 年代不太具有竞争性的、共识取向的政治学的批判中,也表现在对民主方式的探索中,按照这些方式,民主或许不只是被准职业化、官僚化的政党支配的选举问题。这一视角也提示人们思考,工会有时赖以成为官僚化的权力结构而非叛乱工具的种种途径。它处在某种“新左”观点的核心位置,与主流的“阶级与劳工”叙事之外的一系列运动相互影响,比如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学生抗议、和平运动等。在将新的声音带入公共领域的诸般努力中,通过重新关注作为民主制中心的公开辩论,这一视角得以清楚表达出来。对于公共领域中的文化政治学的日益关注,促进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又一群研究者唤起人们对“新社会运动”的注意,那些运动反映了一系列新议题和对劳工斗争与福利国家的某种信心崩溃。它们从事于认同和自我蜕变(self-transformation)议题,尝试直接而不是通过影响国家去改变文化和社会关系。这条研究思路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变迁的可能方向、文化的角色及个人参与

社会运动的经验的看法。不过,奇怪的是,这些人创造了“新社会运动”这一短语,歌颂主导叙事的终结与自我限定的运动计划的多样性,却对“旧社会运动”有一种较为线性的、统一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的著书立说让人觉得,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像真的存在一种主导叙事,好像劳工运动肯定是现代的主导社会运动,好像它或多或少直接推动了现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创立。这种观点大大低估了早期运动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它们很多与20世纪晚期的新社会运动颇有共通之处(我将在第九章进一步讨论)。

在同一时期,“新社会史”也影响巨大(后来日渐被与新社会运动有许多共同点的文化史取径替代)。它的实践者力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扩大了所关注的问题范围和人群种类。许多历史学家反对以国家层面的政治为重心,而着眼于从口味文化到家庭结构、性关系和休闲活动等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虽然这其中很多并非明显聚焦于政治学或社会运动,但是人们日益领会到私人性能够借以成为政治性的各种途径,领会到运动如何能够针对文化而不是国家而发。在少数情况下,有人还革新性地研究了普通人如何形塑政治以回应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动用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和新文化(这或许密切关联着精英文化,或许不是),横向地而不是通过精英领导组织起来,帮助确立政治议程而不是仅仅选择站在哪一方。

假如给这些较为宽广的视角贴上人名很重要的话,那么查尔斯·蒂利在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代替集群行为的心理学方面最具影响力,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理论家(尽管C.赖特·米尔斯在英语世界是象征性的重镇),阿兰·图海纳是支持新社会运动观念的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尽管他的学生阿尔贝托·梅卢齐(Alberto Mellucci)是这方面的主要理论家),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新社会史方面至为重要的著作。<sup>①</sup>当然,这些方面无一不是孤军奋战,并且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路线,有的受到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影响,有的受到对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安东尼·葛兰西的兴趣复苏的影响,

---

<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蒂利、哈贝马斯、图海纳和汤普森大体上是同代人(出生于1924—1929年之间)。更进一步说,这四个新视角的创立相互重合,而不是简单地前后相继。

响,有的受到反殖斗争经验的影响。我不伪称要提供一项面面俱到的概览。毋宁说我的意图是为本书下文框定一个语境。

本书从社会运动的这四条研究路径中获益良多,也不乏心心相通之处。但是本书的统一构想是提请大家注意这一项项研究工作所忽视或低估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谓的激进主义的根源。扎根于传统文化或者强大的地方社群,为激进地质疑既定社会秩序同时质疑“进步”变迁的自由主义议程的各种动员提供了资源。这种扎根性(*rootedness*)被阶级意识简单增长的各种叙事遮蔽了,因为很多激进工人实际上抵制被转变成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同样的,民主的公共领域逐渐扩大的观点,也掩盖了19世纪早期占主导的布尔乔亚公共性被积极排斥行动所形塑的程度——甚至在18世纪晚期获得了更多承认和发言权的工匠激进分子也被排斥。激进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与志在偏离日渐浮现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议事日程的那些手工业工人和其他人等一样,根源于遭受政治排斥的经验。传统观念和新文化创造性混杂起来形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也塑造了驱使普通人挑战政府或雇主的认同与自我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变得激进可能有几重意思。有理论家们的哲学激进主义,他们企图利用理性分析和系统重建纲领直探社会本原。有活动家们的策略激进主义,他们(无论基于何种议程)寻求即刻变革,为达目的准备好了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极端措施。还有某些人的更矛盾,可能也更保守的激进主义,他们竭力让共同体和文化传统中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免遭资本主义发展的灭绝。这些方面常常相互贯穿,造成根本性的社会变迁,也就是深入社会秩序内部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变迁。

激进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较为极端、果决或者说急躁的自由改革主义。罗伯斯庇尔就被当作个中典型。他既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发言,又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热烈苦行者发言。在“惩罚人类压迫者”的极端渴望中,罗伯斯庇尔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sup>①</sup>(1793—1794)的中枢。他认为恐怖是“美德的表现……是民主一般原则得出的

---

<sup>①</sup> David Jordan, *Robespierre and the Politics of Virtue*, p. 54.

自然结论”<sup>①</sup>。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追随者,但是明显持有一些出于实践权宜考虑的观点,它们不可归于这些源头。从此,激进主义就被简单当成极端主义。但是,这样的见解将激进主义映射到一种政治光谱里,它被想象为从右翼的反对派延伸到左翼的激进派,居中的是各种形式的温和保守主义和温和自由主义。罗伯斯庇尔坚持认为必须处死路易十六,然后继续前进去摧毁较为温和的、坐在国民大会右侧的吉伦特派(他称之为大革命的叛徒)。虽然这幅图景源于法国大革命,但是这在革命和激进政治方面均误导了我们。它暗示是极端主义和急躁行为界定了激进主义。但其实更常见的是,造成革命和激进主义的经常至少部分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更信奉自由主义或飞速变革,而是信守他们愿意捍卫的既有生活方式或他们愿意重建的衰败生活境况,也致力于某些机构(比如政府)的急剧变革——他们寄望它们能让他们实现别的(有时是传统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最具持续性和影响力的民众激进主义分析,但是并没有完全跳出这一误导性的公式化表述。尽管它与自由主义有别,可是即便在它那最黑格尔化的许多辩证阐述中,它也仍然保留了一种另类的进步理论。马克思主义做出过重大知识贡献,尤其是有益地区分了推进行动的矛盾(contradictions)与不那么基本的冲突(conflicts)。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劳动者生活状况的矛盾之间不是简单直接的联系。马克思希望产业工人直面日益加剧的贫困化,被迫从事阶级斗争——同时日益加深的系统危机削弱了资本主义本身。但是许多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革命的)斗争是由被资本主义放逐或胁迫的那些人发动的,不是工人阶级雇佣大军中的人。资本主义以多种方式造成了激变,不止因为剥削劳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将阶级斗争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动力难乎为继的预期相联系。他们认为只要工人有了正确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工人动员就是必要的或必然的,或者起码也

---

<sup>①</sup> Robespierre, “On the Principals of Political Morality”, 1794 年 2 月的演讲,引自 Richard W. Lyman and Lewis W. Spitz, eds., *Major Crise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pp. 71-72. (中译本参见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76 页。——译者注)

是一个可行选择。<sup>①</sup>至少对很多人而言,马克思主义也怀有一种假设:唯有阶级认同能够团结激进斗争;激进政治团结出现在不按阶级身份界定自身的人们中间的可能性被低估了。<sup>②</sup>但是,虽然阶级不平等可能是基本的、重要的,别的动员基础(尤其是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至少同等重要。

单纯的工会意识与阶级意识之间的著名区别,可以解读为指示了一种连续统(虽然一种更加辩证的见解有争议地贯穿于马克思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黑格尔化提法之中),该连续统经常被理解为涉及支撑着集体行动的利益上的明晰性直线递增。这一观点对大众激进运动的根源、维持它们的社会条件以及它们有时能够促成深远社会变迁的环境,都把人引向歧途。我的部分主张是,工业资本主义与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面临灭绝之虞的那些人的生活形成远为直接的矛盾,而产业工人面临着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但常常可以为更优的待遇进行谈判——至少说来,只要工业资本主义仍在上升就会如此。

激进主义最好不宜理解成一种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在某一点上激进的观念,在另一点上可能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乃至是保守主义的。对秩序的势力构成激进挑战的活动家们也可能被对立的信仰和价值观鼓动起来。问题是他们的社会处境、渴望和自我理解是否令他们与普遍情势和变迁模式格格不入。在工人等能够获得增益型改良的地方,他们就不那么激进。当增益型改革被顽拗的精英阻挠但原则上仍有可能时,他们偶尔会诉诸策略性激进主义。但是当他们的各种生活方式面临被连根拔除的威胁时,激进政治甚至能够吸引大体上保守的人民和社群。

这并不意味着新思想无关乎政治激进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平等主义民主的新构想(如托马斯·潘恩那种)诱激起许多人的注意、希望和热情。但是,在美国,潘恩的思想融混着对小农自治权的热烈捍卫、对英格兰人古老权利的主张,以及在尘世建立良善社群的宗教努力

---

<sup>①</sup> 参见韦德·马修(Wade Matthew)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争论的讨论:“The Poverty of Strategy: E. P. Thompson, Perry Anders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sup>②</sup> 或者,有人尝试对诸如在阶级意义上动员被征服的大众反抗外来统治的情况做出解释。

(尽管潘恩是个好斗的不信神者)。在英国,潘恩赞同自由的那些理性主义论证,在同样的小酒馆里被读解成英格兰古代宪法的援用,读解成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约翰·弥尔顿、归功于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斗争寓言,以及创建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召唤。革命的法国将潘恩作为荣誉公民,但是大革命是由工人和知识分子发动的,前者要保护他们行业的权利和自主,后者要保持标准度量系统。

这些思想并非仅在抽象层面上混合。它们被结为一体,是因为不同人群结成了联盟,加入了辩论,建立了关系。这些思想是渗透于英国、法国、美国公共领域发展之中的那种混合物的一部分。它们对公共领域的内容很重要,但也有助于塑造它的形式,尤其是因为它们用各种方式促成了无限扩张的公民身份的观念。不过,对于把公共领域的发展简单看成是从贵族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转型的过程中日益向更多市民开放的故事,我们得小心点。正如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表明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可敬的”公共领域在阶级参与的路径和向多元政治理念开放的路径上都受到刻薄、新式的限制。我们也不可简单地认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应的平民(或者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倒不如说,曾是18世纪全国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的很多新闻记者与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新的秩序势力向外排挤。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打造了与“工匠、外包工以及其他”(借用E. P. 汤普森的说法)的亲密联盟,这改变了每个群体的思想(尽管并非总能制造内部一致性),并促就了一种强劲的激进批判路线。

“秩序力量”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之后,这是后来法国革命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复辟和镇压有时将自由主义者——还有激进主义者——排除出公共影响和权力位置。但是,到1948年这两个群体之间越来越泾渭分明,这也加重了内部的分裂和革命的削弱。追溯与国家工场(National Workshops)和其他团体相联系的工人的社会认同,这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这里(以及尤其是在第七、八章)我不但想指出手工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差别,而且要指出不尽符合左—右连续统的那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从手工业工人激进主义者、蒲鲁东一直到19世纪末的工团主义者,打动他们这许多人的那些分析,与其说是聚焦于依据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或马克思